

符号修辞对地方文化认同再构的文本策略^①

操 慧 高 敏

全球化让地方文化的并置与交汇成为可能，也倒逼着地方文化在全球融合中审视自我，在内省中再构基于地方意义的文化身份与社会认同。逐步媒介化的社会正在使地方文化的认同媒介化，呈现并建构出特有的文化景观，由此而折射出地方文化认同的新形态。其中，符号修辞在地方文化认同感的再构中发挥着积极的形塑作用，它成为一种地方文化符号化再构的当代实践，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其中的机理。本文试以“天府文化”的文本传播为个案，着重例析其历史文本、新闻文本以及文学文本借助符号修辞再构成都文化认同的文本策略、表征及当代转型。

一、全球化时代再塑地方文化认同的必要

人类文明诞生之初，不同的共同体散居于世界各个地区，各民族与地方之间彼此隔绝，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大多出于对生存空间的争夺，战争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初期最主要的交往方式。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新航路的开辟以及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战争逐渐让位于剩余产品的交换，进一步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②。自此，过去地方的和民族的相互隔绝和相互独立的状态被逐渐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从经济领域开端及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治领域，并进一步深化到文化领域，造就了文化全球化的景观。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新型主流媒体的竞争力构建与评价研究”(16BXW024)的阶段成果。

② 刘波：《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价值选择》，《学术交流》2003年第7期。

文化全球化,意味着文化价值之全球意识与实践的加强与拓展。在地方的价值和意义仍然保持重要地位的同时,人们越来越多地介入超出他们身体所在位置的网络之中^①。

一方面,全球化使得不同文化的并置、融合、碰撞和渗透成为可能,以往阻碍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摧毁,文化之间的接触相较以往更为频繁。通信技术的日益进步,导致人类交往的时空界限不断被突破,使不同文化之间得以实现即时便捷的全球化交流。其间,地方文化面临冲击和再构之境。具体而言,全球化时代所携带的高度流动性、开放性、不稳定性正在消解地方的本土性、稳定性与封闭性,文化整合的全球化过程使地方文化的边界濒临瓦解,“原有的地方想象与现实之间出现明显的断裂”^②。地方的意义逐渐被全球化、现代化的力量所消解,人们在心理上和情感上对地方文化产生了疏离感,与之伴生的是地方文化的一度边缘以及地方文化认同危机的加深。与此同时,由互联网构筑的虚拟社区逐渐模糊着原有的地理疆界,制造出“情境合并”的“无地方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剥离着人们的地方归属,导致认同的某种空白与断裂。

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不但推动着各种文化行为体之间增长着的互动关系,而且也在这种互动中创造和强化着不同的文化个性^③。换言之,地方文化不可避免地将在与“他者”的社会互动中审视自我,在内省中再构基于地方意义的文化身份与社会认同。观照当下的文化实践,我们不难发现,文化之间的碰撞在产生冲突的同时也在相互哺育,在此过程中,各种力量不断扭转文化发展的动力方向,倒逼着地方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走向一种新的认同。也因此,文化全球化的显著特点彰显为混杂性。这就意味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可以使不同的文化在媒介空间中快速流动并处于一种混杂状态,也因之使个体的地方认同在这种流动性与混杂性中处于动态的解构与重构,从而走向一种多元化、个性化的新型认同。但这种多元化认同并不排斥地方文化的全球化传播,而是跳出原有的狭窄视野,构建着一种全球与在地互动的“全球地方感”,它基于地方,但又置身全球,意欲找寻两者关联下的文化回归。由此可见,地方文化认同在全球化冲击与再构中愈显其再塑的必要。

二、符号修辞作为地方文化认同再构的策略选择

何为地方文化认同?简言之,就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特定人群对该地区特有的文化

① 刘建明:《文化全球化与地方文化认同》,《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② 钱俊希、钱丽芸、朱竑:《“全球的地方感”理论述评与广州案例解读》,《人文地理》2011年第6期。

③ 金民卿:《文化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全球文化体系》,《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符号、文化理念以及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在观念和心理上的共同认可。这种认可在本质上是基于“想象共同体”的一种共同的文化行为与文化心态，主要通过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心理特征、道德信仰、社会组织形态等方面表现出来^①。人们通常在对这些文化形式和社会习俗的体验中寻求归属感，这种体验除了个体的亲身经历外，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传媒的意义阐释。从亲身体验感知到借助媒介的文本阐释，地方文化在多通道中得到了全方位呈现和建构，其中，“媒介化”构成人们感知地方文化的多元方式，它也让此类文化接受与认可变得更加日常、普遍、便捷和生动。

由上可知，逐步媒介化的社会在描述着这样的地方文化景观：地方文化符号通过现代传媒的再现与想象，日益培养出一种特有的“地方感”，以此维系并强化地方文化的归属。地方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心理上的价值认同，就本质而言，存在于人们的精神构想中，而作为“文化容器”的媒介，由于能够为身在其间的人们的身份重构提供丰富的资源及可能，因而在这种想象的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即经过对地方文化符号的策略性表达，实现对地理空间的感知和再阐释，由此唤醒或强化人们对地方的记忆和认同，即实现不同程度的地方文化归属。随着媒介表达技术的更迭进化，文本类型不断走向丰富与融合，地方文化再现所依托的载体、所借助的符号日渐多元，它提升了全方位还原地方景观以及个性化阐释地方文化的可能性与丰富性。其中，文本中的符号表征与符号的文化表征依托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语境展现出地方文化认同再构的创意空间。本文即把这种文本的文化符号表征策略视作文本的符号修辞功能及文化认同功能。

修辞作为一种优化表达的论辩术，在过去主要借助语言符号实现劝服目标。“作为意义表达载体或工具的符号”^②与“作为达意传情手段的修辞”^③，两者均以表达意义为共同目标，这确立了符号与修辞的本质关联：即符号离不开修辞，修辞也必然指向符号。随着符号学研究的兴盛，“符号学给修辞学带来了新气象。符号修辞学把修辞推进到各种媒介中”^④。可见，修辞与符号的学术“汇流”为解释不同类型的符号文本与地方文化的认同再构提供了更为紧密和广阔的分析视野。进一步看，符号修辞与地方文化认同也在理论的更新中增添了“交集”，促发了“共识”。如肯尼斯·伯克在其新修辞学中指出，有必要在“认同”维度上重新理解修辞，并确立非语言因素作为符号象征的修辞意义。“新修辞学不再将修辞当作方法和工具，而将它当作无所不在的符号。”^⑤伯克在其修辞

① 叔翼健：《电视媒体文化与移民的地域文化认同》，《南方文坛》2012年第3期。

②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③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世纪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④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页。

⑤ 鞠玉梅：《肯尼斯·伯克新修辞学理论述评：关于修辞的定义》，《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认同观中认为，修辞的最终归宿是促进“共同理解”，“认同”既是修辞的“目的”也是修辞的“策略”^①。由此，符号修辞之于地方文化认同的再构，既在方法上关联适用，又在目标上达成共识。此即为符号修辞作为地方文化再构的文本策略的逻辑理路与必然选择。

“符号很少会单独出现，一般总是与其他符号形成组合，如果这样的符号形成一个‘合一的表意单元’，就可以称为文本。”^②在地方文化的符号表意中，那些携带意义等待解释的文本，成为沟通的“桥梁”，在认同的再构中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符号的具体修辞手法，符号修辞从宏观上仍然需要探寻符号文本的构成方式以及背后所蕴藏的叙述技法与结构思维，这是实现地方文化认同再构的逻辑要核。换言之，符号修辞可视为符号文本从发送者指向接受者的意义连接机制，它凝结着发送者的意图意义，可以通过特定的文本策略，尽可能扩大意图意义与解释意义的“交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言的符号修辞即为一种文本策略，它是在一定的语境下通过特有的文本体例及其策略性的叙事技法再构地方及其表征地方文化的过程，即：抽象的“地方”概念以及地方文化识别借助于特定的文本结构方式及其文本叙述思维，从而被具象表达的一个叙事表意过程。只不过该过程以地方认同作为文本“传情达意”的归旨和文化感知的路径，也就是说，通过文本中特定的“文化呈现”来沟通主体，不仅触发文化共鸣，唤醒或强化人们的地方记忆，还从深层次的可感文化中展开关于地方的想象，赋予地方文化内涵的阐释动力。

三、符号修辞在地方文化认同再构中的文本策略表征

呈现地方文化的符号文本有多种类型，本文选取历史文本、新闻文本以及文学文本，“扎根”于这三个具有代表性和较大文化传播影响力的媒介文本，以成都所表征的“天府文化”作为地方样本，例析其符号修辞再构成都文化认同的文本策略和文化表征。本文所分析的历史文本、新闻文本与文学文本，是指那些与地方文化相关的、直接书写地方的符号文本。这些文本策略中的文化符号及叙述修辞，演绎了地方文化认同再构与符号修辞的发生机理，有助于我们贯通理解地方文化何以有效传播与实现认同的切入点和突围方向。

① 刘涛：《视觉修辞何为？——视觉议题研究的三种“修辞观”》，《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②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

(一) 历史文本的认同修辞：记忆唤醒的文化基因

所谓历史文本，作为对过去事实的如实叙述，是在叙述的时间点上强调“溯流而上”，它是指对过去事实的回溯引发了关于过去的感知，进而生成一种历史记忆。除了在对时间上对历史文本的叙述偏向进行指认外，历史文本仍然具有空间指向与地域归属，即历史是特定空间的社会活动，它和地方密切相关，是地方记忆生成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地方作为记忆的仓库，它储存日常生活记忆以及历史事件的记忆，并在特定情况下唤起个人和集体的记忆^①。

在历史文本与地方认同发生关联与转化的路径中，记忆修辞的唤起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历史对于地方的书写，不止是在描绘地方、阐释地方，其目的还在于建构认同，它试图在地方的过去与地方的现在交界中搭建两者间的心理联结。“如实地说明历史”，这一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下的历史观念，尽管仍然占据着主流，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主体”^②，即：历史的叙述不可避免地涉及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的选择，事实主体的确立便凝结着叙事者的主观选择，而这种选择表现在历史文本中，就是符号修辞所运用的文本策略。具体而言，就是那些被历史文本频繁选取的文化符号，作为地方文化的根脉，极可能置换为现今地方文化认同的标识与代言。而历史学家对于地方历史的追忆将促进人与城的精神互动，从而建立人与地方的“专属档案”。

呈现“城市文化”的历史文本类型繁多，包括地方志、地方档案、地方报刊以及地方书籍等。其中，地方历史类书籍在地方文化的书写中构成了特有的文化景观，成为沟通人与地方记忆的独特文本，在地方记忆的描绘与文化认同的构建中至关重要。在成都地方历史文化的书籍之中，王笛的《街头文化》、《茶馆》、《袍哥》等著作成为当今成都人了解“老成都”和外地人想象成都的重要文化读物。该系列书籍分别选择成都街头、成都茶馆和袍哥群体作为事实主体，从浩繁的历史长河中拾起典型的文化碎片，即以“微观对象”作为叙事主体，提取出成都文化的特有基因，从而开始“显微镜下的细胞观察”^③。这与传统叙事中强调全方位呈现历史事实的观念不同，它把历史看作由无数“碎片”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通过阅读这些作品，人们从微观线索中进入成都文化，进而根据自身体验涌现出对于地方文化的关怀与认可。例如，在“茶馆”这个看似微小的考察对象中，通过对众多历史事实的合理串联，关于成都的茶馆记忆被作者生动还原，

① 李彦辉、朱姝：《地方传奇、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以黄埔军校旧址及其参观者为中心的研究》，《人文地理》2013年第6期。

② [英] 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页。

③ 潘文捷：《历史学家王笛：历史研究不应丰富多彩民众历史不屑一顾》，《界面新闻》2018年10月18日。

而“茶馆”作为成都地方文化的象征，又在此间描摹中折射出 20 世纪上半叶成都的社会状况与成都人的生活风貌。当茶馆作为地方文化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认同同一模式的个案时，茶馆符号又被赋予“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①。可见，上述历史文本这种“眼光向下”以及“情感注入”的书写方式^②，为人们了解过去成都的社会日常生活，提供了具体的符号线索。这些深具厚重感的历史书写，这些成都文化符号，在学术“合法性”建立的同时也在重新编织已经被遗忘的成都文化“底色”，逐步唤起人们对于“老成都”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

概言之，历史文本对地方的书写是依托于特定的文化符号的历史条件和环境的“深描”，通过抓取、填补、唤醒或强化地方记忆来激发人们对地方文化的感怀。于此，地方文化的底蕴逐渐被勾勒出来，并成为当今地方文化底蕴以及文化影响力构建的认同标识。进一步看，历史文本在文化认同的书写层面可以弥补过去与现在的某种“断裂”，并让特有的地方文化符号在这种新旧联结中，再造历史归属与深层认同，这可以说是将公认的地方文化符号还原于、贯穿于历史情境中的策略选择，也正因为如此，历史文本中的地方文化总是充满那些熟悉的符号重温，从而让立足当下的人们去“拾趣”和“缅怀”，并达至其构成一种关于未来发展中的文化传统与传承的沉淀。

（二）新闻文本的认同修辞：关系联结的共享共在

与历史文本相同，新闻文本以事实为本源，旨在探明事实真相。不同的是，后者着眼于“新近”事实的报道。换言之，新闻的真实在时态上属于“进行时”，而历史的真实是“完成时”。因此，“时效性”是新闻文本区别于历史文本的重要标志。这从时间的刻度中为新闻订立了边界，即立足“现在”，同时以地方的“过去”作为背景与借鉴，以地方的“未来”作为展望与愿景，在新闻书写的“时间绘图”中寻找地方、再造地方与想象地方。新闻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说“新闻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我在此称之为‘公共知识’”^③。作为公共知识的新闻，很少有东西比它的发明及每天的更新对现代文化更有典型和启发意义^④。可见，新闻文本对于阿尔弗雷德·舒茨所言的“共同世界”^⑤

① 王笛：《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余如波：《王笛“微观”老成都：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纸上旧影》，《四川在线》2019年2月21日。

③ [美] 迈克尔·舒德森著：《新闻的力量》，刘艺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④ 同上，第3页。

⑤ 舒茨为了说明人类理解他人的不同方式，将人的社会世界划分为前人世界、周遭世界与共同世界。新闻更多的是关怀共同世界，即一个由同时代人及其人的行动构成的社会集合体，他们互不相识，但是相互理解，共同存在。

的持续性呈现,使得因地方而连接的“想象共同体”在“公共知识”的阅读与感知中得到身份的确认与关系的确立。在此意义上看,新闻在地方文化中的时空坐标被勾勒出来,它显示出新闻在时间上的同步卷入,以及在空间上的文化共在。这种共在特性也决定了新闻文本的符号选择既包括传统文化,又必然会选取当今地方的新文化符号,从而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激发共鸣,构建文化的普遍认同。

以报纸新闻文本为例,它包括新闻、评论、广告与副刊四大“要件”。其中,直接呈现地方文化的当属文化新闻与副刊文本,它们“在面向过去、日常、边缘与当下中,点滴记录所栖居之地的文化脉络以及变迁,绘制出和风细雨般的区域文化之时间地图”^①。进入融媒体时代,地方文化的讲述,不再仅仅依托于专业机构的内容生产,而是拥有更多的个体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地方文化内容的生产中。地方日常生活的涓滴细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现于新媒介空间,使得以往有所遮蔽的细微碎片的文化景观拥有了更多的展演空间。专业内容、组织内容以及用户内容的文本生产,共同构筑了特有的符号修辞景观。它们既是生活场景的再现,也是地方变动的文化书写。

新闻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实践显示,现代新闻媒介在中国的发展与我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轨迹基本同步。即紧跟时代发展的新闻媒介,在我国逐渐融入“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之后,也渐渐置身对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反思境地,从而开始地方文化的“寻根之旅”。因此,作为地方文化“风向标”的新闻文本,尤其是副刊文本,在敏锐的文化感知中,逐步形成一种扎根“地方”又放眼“全球”的开放理念。以《成都日报》副刊“天下成都”为例,“居成都,观天下”的栏目意涵代表的是“更广阔的世界与更深远的视界”^②,旨在从地方内外的关系网络中观察多面的成都,在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共在联结中放眼世界且审视成都。与此同时,“天下成都”所开办的《传承》、《蜀文蜀艺》、《人文地理》、《旧蜀图说》等专栏,以传承地方传统文化为己任,这样的“文化寻根”又在时间序列的历时交叠中追问过去、现在与未来。而《华西都市报》的副刊“宽窄巷”,同样秉承立足本土、结合时代的宗旨定位,即“视野需要有全球性、前瞻性和时代性,但落脚点却要在本土”^③,打造出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2017年,“宽窄巷”升级为“天天文化副刊”,新闻文本的文化“底色”日益浓厚,所借助的文本体裁日渐多元,漫画、老照片等图文版面“好看”且“吸睛”,文本表达异彩纷呈。“宽窄巷”的升级恰是在媒

① 范湘鸿、罗安平:《时间绘图:地方媒体的“区域文化史”——〈成都日报〉副刊的实践意义》,《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② 同上。

③ 赵晓梦:《纸与端齐飞 报纸副刊转型新路探索——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宽窄巷〉副刊创新转型实践》,《传媒评论》2018年第4期。

介融合语境下的创新转型，而与专业内容生产“比翼齐飞”的还有组织内容生产以及个人内容生产，它们释放出地方文化“共享”与地方共同体“共通”的潜力与效力。再如组织内容生产以城市政务微信号“微成都”^①为代表。“微成都”综合应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介符号，从不同的感官通道促成地方文化的“传情达意”，更加凸显人性化、故事化与情感化的叙事手法，让成都文化显示出复合化内涵与多彩的人文魅力。这样的文本策略于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与情感唤起中进一步推进了人与地方的互动。个人内容生产以个人微信公众号“朱毁毁的成都”^②为例。它以个体笔触伸向地方文化的街头巷尾，用光影“图绘”作者眼中细腻且微小的成都，却又能够将这些“碎片”以强烈的视觉形象穿透“隔阂”，直击成都人的心灵。这种雕刻着鲜明个人特色的图像叙事，以及立足“烟火气息”的文本表达，构建起每一位普通市民与地方文化的关联，加深了文本立足写实而延伸无限美好的审美体验。同时，“朱毁毁”（本名朱映辉）也因此具有了文化传播的符号指代及地方文化的识别号召力。

综上所述，新闻文本内含着独特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其作为一种文化书写，就是对过程渐变的记录与感知，这是一个聚合文化与地方性的独特机制。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在特定时空中定位和构建地方性的表意模式，而其中的内容即为地方文化的有机构成。当新闻记录和传播这些内容时，就是在输出具有地方特性的文化意义，意义经由不断的传播循环，就使新闻成为一种可以表征地方文化的符号文本。由此，一个积蓄丰富传统且蕴含独特创新的地方文化得以不断“可见”并被注入时代性，基于此，通过新闻文本传播的意义之网，在此文化生产中编织出共享共在的文化认同。

（三）文学文本的认同修辞：情感想象的文化共鸣

与历史、新闻文本强调对客观世界的事实叙述不同，“文学文本对客观世界的描摹有多种选择”^③，它并不排斥作者主观情感的表达，甚至与作家的主体感受密切相关。这样的书写方式使得“想象”成为文学叙事的约定俗成和审美目标。这种想象赋予情感表达的无限空间，也促成了文学文本与地方文化认同内嵌的修辞选择，从而使人们在情感的体验中获得文化共鸣。与此同时，作为人学，文学文本的人文色彩最为突出，它主要以人作为地方文化符号的核心，以充满情感的故事书写，释放出无可比拟的可读性以及不

① “微成都”是成都市外宣办于2011年9月5日创办的政务微信号，以“在成都，爱成都”为栏目宗旨。

② “朱毁毁的成都”是由四川大学广告学2018届毕业生朱映辉创办的个人微信公众号，曾创作出《成都不是一个天堂》《2.35:1比例下的成都和成都人》、《人间成都》等多篇广受欢迎的10万+推文。

③ 操慧、高敏：《可读与可信：新闻散文化与文学纪实化的互鉴审思》，《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4），巴蜀书社2018年版，第37页。

可替代的情感关怀。这种充满人文色彩的情感认同,即为文学文本符号修辞的主要策略及文化表征。

从文学文本的空间维度来看,文学必然是依托于特定地理空间的创作,因而地域文化的基因不可避免地会植入文本中。严家炎先生曾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地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连接,通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文学的。”^①可见,地方文化影响着文学创作,它使文学文本可以并必然呈现地方文化,反之,文学文本的呈现也会扩展甚至创生地方文化内涵,从而助推读者对地方文化的多元理解。正因为文学文本总是依托于特定的空间,因而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在其文本中找寻到地方文化的因子。

例如,“故乡”作为文学作品永恒的命题,往往是作家文学创作的根源,古今中外均涌现出了不少以地方为特定书写区域的文学作品。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豪杰,他们对于成都的书写,勾勒出独具特色的成都文化。近代成都历史上,巴金、李劫人、何其芳、沙汀等本土作家都曾受到成都文化的滋养,而后又在文学文本中描写成都,反哺成都文化。其中,李劫人的大河系列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被称为近代成都文学作品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大多以成都作为背景与中心,生动地刻画了处于新旧变动中的近代成都。李劫人笔下的“邓幺姑”,其独特不羁的性格表征着成都文化的开放包容生态;与此同时,东西文明交汇的郝达三公馆,同样折射出新旧交替的地方历史,这为我们观察成都的文化脉络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文化符号。巴金曾言:“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②李劫人以深厚的故乡之情与浓郁的成都情结,准确而又凝练地描绘了封闭、落后、愚昧的成都,展示了成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其时成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这种书写并未停留于一味的简单爱恋,而是夹杂着理性的批判与反思^③。由此可见,无论是作家对于故乡的情感依恋,还是小说中的情感书写与抒发,这种家国情怀、故土情怀与儿女情长,不仅多层次地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成都,也立体地展现了一种蕴藏着丰富内涵、充满着“人间烟火”的成都文化。需要指出的是,相较于其他文本,文学文本对于地方文化的书写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反思性与批判色彩,这也启发着我们:对地方文化的呈现与建构必须放之于时代的经纬。时代经纬和当时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影响其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而且其本身也构成了文化认同的地方性和理性根基。

概言之,文学文本基于地方又高于地方的想象叙事,为地方文化情感的生发和抒发

① 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

② 谢扬青:《巴金同志的一封信》,《成都晚报》1985年5月23日。

③ 胡静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成都形象》,西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第14页。

提供了广阔的展演空间,这种情感通过作家的乡恋情结、家国情怀,以及内容创作中的情感书写、联想,共同激发出读者对于地方文化的情感共鸣。它具体表现为:文学文本通常从现实生活中找寻创作灵感,提取地方文化符号,而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将其结构到充满人文关怀的、极具可读性的故事文本中。正是这种植入了典型地方文化元素的符号文本,可以展开亲切而熟悉的生活场景,可以借助故事来讲述地方,可以通过人物性格来隐喻地方文化特性……这些文学叙事的技法,其实都是巧用地方的符号文本,它们在折射地方社会的复杂变迁的过程中型构着地方文化性格,进而作为一种整体修辞成为地方文化的感知代言。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文学书写时常也对地方发展的反思融入优化文化的自觉,它让文学文本的认同建构充满着动态解构与重构的张力,从而令读者的感知伴生更加能动的憧憬和展望。正是这些彰显作家主体价值取向的文本,也同时映射出地方文化认同中的博弈与多维思辨。立足于作家对地方文化的书写,“故乡”、“家国”的文化情怀作为符号修辞的独到隐喻机制,使其文化认同的地方性葆有永不衰退的“灵气”与“灵韵”。

四、结语

置身于全球化时代与媒介化社会,地方文化的“稳固态”正在遭遇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文化间的互审以及碰撞中的互融。人们对于地方以及地方文化的认同将逐步摆脱单向认可的“孤芳自赏”,转而走向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放认同和动态包容。本文从符号修辞与文本策略的转化机制切入,意在探索作为修辞功能的文本在再构地方文化认同中的策略表征。描绘成都文化的历史文本、新闻文本及文学文本的叙事策略显示,叙事是文本的主体和结果,修辞是叙事预期和效果实现的联结转化器,从地方文化的发展变迁与认同再构的文本分析审视,地方文化的符号化及有效叙事是其符号修辞作为整体过程与文本策略表征的关键。

前文所分析的三类典型文本策略,体现出对地方文化认同再构的符号修辞功能,主要表现为:

历史文本以记忆修辞作为主要的文本策略。通过地方记忆的书写以及唤起,借助特定的传统文化符号钩沉地方文化的“历史层”,填补今日地方与过去地方的记忆“空白”,在记忆联结中沉淀地方文化的认同与归属。

新闻文本以关系修辞作为主要的文本策略,在时空坐标的确认中凸显新闻文本对于地方文化认同的伴随和再造。它以“现在”作为审视过去与未来的基点,在立足本土的同时放眼“天下”,以新闻文本特有的社会中介力,网罗多层多质的符号资源,使得地

方共同体在实录与阅读中感受文化的共享共在。

文学文本以情感修辞作为主要的文本策略，以它特有的“故土”深情与故事笔法来调动丰富多彩的文化符号，以此隐喻和折射社会生活变迁，并借助文学创作的特有想象，激发受众对地方文化的憧憬与情感共鸣。这种情感的唤起并非一味地指向赞美与宣扬，而是伴随着作家的深刻反思与理性批判，由此推动着我们对于地方认同内涵与时俱进的理解升级与文化再省。

尽管历史、新闻以及文学文本对于地方文化的呈现以及认同再构的符号修辞功能各有侧重，但是在当代的文化生产与媒介消费中，它们却彼此交错，走向融合互鉴。我们可以从成都文化的文本书写中看到，历史文本与新闻文本在探问真相的同时，也在借鉴文学文本的“情感修辞”，以提升文本的“可读性”，当然这种“可读”追求以“可信”作为前提，即在事件的实录中强化人文关怀，以故事化的叙述手法展现地方文化符号与人物经验的互动；新闻文本与文学文本在地方文化的描摹之中，时常回望过去，沉淀地方记忆，运用“记忆修辞”联结地方的过去与现在。所不同的是，新闻文本通过记忆的唤醒与传承来观照现在，文学文本基于想象的描绘来呼唤记忆或建构记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在对地方的回顾与想象之中，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与地方的“现在”相连，在这种历时性的“关系修辞”中以不同的方式共享共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总是能够从历史与文学文本的书写中找到当前文化赖以生存的根脉与源头。可见，不同的符号文本既有各自固有的修辞技法，也在文化生态的语境重构中作“跨界”审思，试图借鉴多元化的修辞策略来提升传播实效，从而凝聚动态发展中的地方文化认同。

成都文化的符号修辞实践显示：“眼光向下”与“情感注入”作为这些文本的共性修辞理念正在有效凸显成都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并增强成都文化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眼光向下”即以“微观视角”提取相应的地方文化符号，在此引领下，深入到地方的日常生活，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映射地方文化的特定横截面，从而寻找滋养地方文化的现实土壤；“情感注入”则是指文本的字里行间所倾注以及所流露出的人文关怀，它凝结着文本发送者与接收者深深的地方情结，同时在认同再构的社会效果助推下提升文本表达的“可读性”。这些修辞理念启示我们的文化生产：地方文化认同再构的符号修辞在于促进人与地方的互动交往，“点燃”交往火花的便是文本描述人与地方的修辞智慧。可以推想的是，在“媒介弥漫于我们的感官，我们对世界的感觉充盈着媒介”^①的媒介化社会，这种立足于个体、立基于生活的“眼光向下”将进一步拓展个体认同的

^① [英] 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多元化表达，这也是生活审美构建地方认同的心理投射。当下，互联网的网络概念，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隐喻^①，它从本质上预示着地方文化中多重关系的连接。而在人与地方文化的关系连接中，抑或说是认同连接中，情感是人与地方之间最具穿透力的纽带。概言之，在这个互联互通的媒介化社会，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互动会更加紧密，而文化认同的需求会愈加显得必要、重要和稀缺。正如符号修辞投射到文本策略中的使用及功用所示，“越是地方的就越是全球的”之认同哲思将促发我们探寻修辞符号化与符号修辞功能的新境界。这是我们再构地方文化认同的使命与自觉。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① [美] 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李冠福译，朱洪文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